

《祖国在我心中》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师生情深

主 编 刘 蓬
吴晓梅
编 委 于国慧
王 放
方 东

知 识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88 号

责任编辑:陈红军

封面设计:童行侃

责任校对:余景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生情深/刘蓬,吴晓梅主编.—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11

(祖国在我心中: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ISBN 7-5015-1177-2

I. 师… I. ①刘…②吴… II. 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读物

IV. G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2384 号

《祖国在我心中》 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师生情深

刘 蓬 吴晓梅 主编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33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6 次印刷

35001-4100 册

ISBN 7-5015-1177-2/G·456

定价:6.00 元

目 录

永远的师生情

- 记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们…………… (1)

有志必有所为

- 记朱德的第一位老师席聘三先生…………… (10)

师长育英才

- 记周恩来的两位恩师…………… (14)

家训 私塾 学堂

- 记刘伯承的三位启蒙老师…………… (22)

珍贵的师生情谊

- 记蔡元培和许德珩…………… (33)

感谢恩师的指点

- 记臧克家和他的老师们…………… (45)

对人类的义务是做一盏灯

- 记文学大师沈从文…………… (60)

一代画师 桃李天下

- 记徐悲鸿的“师情画意”…………… (68)

拜师学师成大师

- 记齐白石和弟子娄师白…………… (74)

既是翻译家 又是革命者

- 记王洪博的恩师陈望道教授…………… (80)

师友情深

——记张荫麟和吴晗的友谊 (90)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记竺可桢先生 (95)

教师的楷模

——记陈炳奎的老师谢霖先生 (100)

热情而严格的引路人

——记陈望衡和他的老师朱光潜 (104)

春风化雨桃李香

——记王力和他的老师赵元任 (109)

“卡门—钱学森公式”的由来

——记钱学森和他的老师卡门 (119)

山一样的恩 海一样的情

——记华罗庚和他的老师王维克 (125)

呕心沥血办学堂

——记朱剑凡先生 (134)

道似无情却有情

——记欧阳中石和他的老师武岩和尚 (140)

难忘师恩

——记方令孺和她的学生裘樟松 (146)

人生路途的引导者

——记夏鼐先生和他的学生夏麦陵 (155)

身为师表育后人

——记罗大冈先生和他的学生葛雷 (160)

笔缘

——记启功与陈启智 (164)

情结

——记孟伟哉和乡村教师贺逢贤…………… (171)

形为师生 情同父子

——记刘叶秋和他的学生宁稼雨…………… (174)

余霞尚满天

——记黄天骥的老师王季思…………… (180)

永远的师生情

——记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们

1914年的春天，退学已近半年的毛泽东又一次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因省立第一高中课程浅显，限制颇多，校规又非常繁琐，无法满足自己广泛的求知欲望而退学自修。离开当时规模很大的省立第一高中，并没有使毛泽东感到后悔。相反，他却因可以自由独立地研究学问而感到兴奋和舒畅。他寄居在长沙湘乡会馆一间狭小的房间里，自己制订了一个完整的自修读书计划，开始了刻苦而又艰难的读书生活。在这半年多的自修学习中，他大量地阅读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和外国名著，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思考新的问题，并联系社会实际进行分析和研究，得到了很多启示。清贫而充实的自修生活刚刚起步，客观条件就使他继续自修的愿望落空了。首先是来自家庭的压力。在家务农的父亲决定不再接济这个既不进学校，又不谋职业的儿子。而毛泽东的栖身之处湘乡会馆又因打架滋事不断，而终日不得安宁。毛泽东无奈，只好又一次报考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不久，第四师范学校合并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便迁入这座有西洋风格建筑的学校内，度过了他4年的学校生活。即使毛泽东迫于无奈又一次回到了学校，即使毛泽东对自修的学习生活有着强烈的向往，并认为这是“极有价值”的半年，但这座有着新式学风、环境优雅、藏书丰富的学校很快使毛泽

东安下了心。因为，他在这里遇到了对他一生都影响至深的一批优秀的老师。直至晚年，他仍不时地提起这个难忘的学校和他敬重的那些老师们。

杨昌济，又名杨怀中，湖南板仓人。书香门第出身的杨昌济早年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并考察游历过德国、瑞士。学成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立志培养国家有用之材，改造贫困的中国。来到第一师范后，他教授修身、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哲学。他教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往往是一字一句地照念讲义，既不重复，也不讲解，唯一的要求是大家可以自由讨论。学生们开始很不适应，耳闻的这位学贯中西、通古博今的优秀教师只会念讲义，说话又欠流畅，不禁兴趣索然。然而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听杨先生的课时尤其认真。单是杨先生的《西洋伦理学史》，他就工工整整写了七大本笔记。他认为杨先生虽然不善辞令，但其讲义却很有价值，言简意赅，能解决实际问题。他说先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光明正大的人”。所以毛泽东十分崇敬杨昌济先生，并常常去拜访他，向他求教。杨昌济也同样十分欣赏这位思想活跃、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尤其是对国家大事乃至国际大事都很关心的学生。

当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兴起，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风靡一时。杨昌济便把陈独秀主办的刊物《新青年》送给毛泽东看，并鼓励毛泽东多投稿给新青年。毛泽东也正是在这时开始了解和接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并以“二十八画生”的署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的文章，号召国民用自身力量改造中国。杨昌济不仅在知识上和思想上深深地

影响着毛泽东，而且在生活上也身体力行，提倡一种民主的科学的新生活。他锻炼身体，洗冷水浴，作深呼吸，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毛泽东也模仿老师的样子，清早起来在山上晨跑，然后下河塘游泳，并且在冬天也坚持露宿和冷水浴。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主张“身心并完”，受到杨昌济的赞扬。

1918年9月，从第一师范毕业后的毛泽东，为进一步探索中国的前途，来到北京，寄宿在一所破旧的房子里。已在北京任教的杨昌济闻知毛泽东来京，并且生活困难，便主动介绍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毛泽东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自修，同时还经杨昌济介绍，访问过一些学者、名流，加入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杨昌济欣赏的这名学生，后来又得到女儿杨开慧的爱慕。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成革命伴侣。1921年，杨昌济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作为学生，作为贤婿，他努力地尽了自己晚辈的责任。这位他在学生时代与之感情至深的老师，成为他日后无比怀念的人。

另一位对毛泽东学生时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老师便是徐特立。这位当年在湖南赫赫有名的教育家，被誉为小学教育界的“长沙王”。他曾创办长沙市第一所平民夜校和长沙县第一所小学。辛亥革命后，他在既无经费，又少房屋的情况下，艰苦创业，兴办了长沙师范学校。后来长沙县的小学教师大都出自其门下。他还创办过女子师范学校，对失学的女孩子给予免费照顾，并兴办了一所孤儿院，亲任院长，招收孤苦儿童，教他们学习。对这样一位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老师，毛泽东是非常钦佩的。他和徐特立交往很多，并一直虚心地

向徐特立请教。徐特立曾告诫毛泽东“不动笔墨不看书”，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毛泽东自此严格按照徐特立先生的要求去做。每读一本书，他都要在重要的地方作笔记和批语，读完后还要写心得体会，认真思考，形成了习惯。仅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所写的各种摘记、读书笔记和日记等就有很多，更不用说后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内几万册书上的眉批了。这一习惯，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在他离开学校，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也依然惦念着这位恩师。

1927年，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革命者的白色恐怖面前，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徐特立作出过重要贡献。1937年1月，毛泽东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在延安为徐特立先生祝贺六十寿辰。他特意按照湖南的风俗习惯，亲自为徐特立先生戴上一个红布锁，并说：“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在读他为徐特立先生写的祝寿信时，毛泽东念道：“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1947年初，蒋介石派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毛泽东为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当时中央机关大部分已疏散，年届古稀的徐特立也随部队撤到了绥德，准备东渡黄河。胡宗南进攻陕北之时，摸不清党中央机关究竟在哪里，因此举棋不定。而留在陕北的毛泽东为吸引敌人的主力并歼灭之，便巧妙地向敌人发出了一个信号：党中央决定在陕北为徐特立祝贺七十大寿。徐老桃李满天下，一时间蒋管区和陕北边区遥相呼应，新华通讯社也通过无线电波把这一喜讯传遍全国。徐老深深地理解毛泽东的用意。这位叱咤风云的学生不仅仅表达了他对自己的尊敬，同时也寄

托着对自己的信任和期待。当时毛泽东的处境异常危险，在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之时，毛泽东和敌人只有一山之隔。雄韬伟略的毛泽东冷静地分析着敌我双方的优劣变化。他不离开陕北本身就极大地鼓舞着解放区人民的斗志。在危险而又巧妙的运动战中，毛泽东向他的老师发出了邀请。徐老立刻意识此举的重大意义，他对绥德专区的同志说：“这是政治寿，我必须回到延安去，再危险也要回去。”徐老毫不犹豫地回到了延安。毛泽东非常高兴，他代表党中央，在给徐老的祝寿信上对他的老师予以高度的赞扬。他说：“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

毛泽东素以中国文史知识的渊博、诗词书法的豪迈而为中外人士所称道。然而言及这位伟人在古诗词和书法方面的博大精深，不能不提及一位在他学生时代对他要求非常严格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这位性格急躁、严格得有点偏执的袁吉六先生，人称“大胡子”。他早年曾是湖南省保靖县的一名举人，在当地设馆教学时，由于博学多才，精通古文，写得一手好字而有着很高的名望。1912年袁先生举家搬迁新化县，出任第一师范国文教员。这位注重古文教学，学识渊博，讲解精辟的国文教员非常喜欢毛泽东写的文章，常常把毛泽东写的作文批上“传阅”二字让同学们学习。正因为袁先生钟爱自己的这位优秀学生，所以对他格外严厉。

毛泽东为记录下自己的思想发展，总是习惯于在他写的作文结尾处注上日期，以作为自己理解社会能力的一种记录。然而袁先生由于不理解毛泽东的用意，所以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学生的作业只要先生改过就行了，无需再保存下来留作

记录。他要求毛泽东将写有日期的作文一律撕掉重抄一遍，毛泽东未予理会。他当即怒从心头起，气冲冲地将毛泽东的作文撕了下来。毛泽东也厉声质问，要拉他去校长室评理。一场冲突过后，学生们都认为袁吉六先生的做法不尽情理，不时地在袁先生的课上表现出对他的不满。毛泽东却并未因此而全盘否定袁吉六先生。他喜欢上袁先生的国文课，深深地为他的国文素养所吸引，依然表现出对他的尊敬。后来毛泽东的同学周谷城回忆说：“袁先生讲课很神气，但毕竟扣分太紧，学生不喜欢。毛泽东对这位先生却有好评。当时学校的学生由于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都竞相模仿他们的文体写作。袁吉六先生称这种半文半白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认为作文之道，首应固本，完全模仿康、梁，实非所宜。他告诫毛泽东说：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他还经常将毛泽东叫到自己的卧室，为他精讲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借给毛泽东各种不易借到的善本书。毛泽东深受教诲，开始认真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变文风，学写古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毛泽东的国文基础和文章都大有长进。连很少夸奖人的袁吉六先生对毛泽东也大为赞赏，他说毛泽东的文章已‘大有孔融笔意’。”

1915年，毛泽东参加了第一师范学校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他带头写出了一份痛斥校长办学无能、贻误青年的宣言张贴出去，提出赶走张干的要求。后来有人告密，张干为此要开除这个带头“闹事”的学生。袁吉六先生知道后，同杨昌济、徐特立等人极力表示反对，并多次出面为毛泽东担保。他评价毛泽东为“挽天下于危亡者”，再三要求张干收回成命。张干迫于压力，只好作罢。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并未忘掉当年曾担保过自己的这位国文老师。他在百忙之中曾4次打听老师的下落，当知道袁吉六先生早于1943年就去世时，深为悲痛。1952年，他特意为这位严厉的国文老师的墓碑题写了“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遒劲的大字。他还多次托人给患病的袁师母捐钱，希望她能过一个幸福的晚年。1965年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郭沫若、章士钊等人。席间追忆起袁吉六老师，章士钊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师的身份。”

还有一次，毛泽东曾感慨地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过：“我能写古文，颇得益于袁吉六先生。”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曾求教于一位年轻的历史老师。他和毛泽东同是湖南湘潭人，虽然在名份上是师生，但此人却只比毛泽东大3岁。年轻人共同的锐气和志向使毛泽东和这位历史老师交往甚密。他们时常在一起讨论时事，研究学问，成为挚友。这个人便是黎锦熙。他虽为毛泽东的历史老师，但他和毛泽东讨论问题时却无所不谈，从读书的方法到改造社会，莫不渗透着他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心。毛泽东曾在一封致萧子升的信中这样评价黎锦熙：听说黎邵西先生好学，我前往征求意见，很多问题我们都很谈得来，而且有条理又详密。研究问题的方法，也极为完备。我和黎先生感情很深，从我有生以来到现在，能见到这样有造诣的人，只有他一个。

1915年9月，黎锦熙调往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任职。分手之后，两人并未因路途的遥远而中断联系。黎锦熙一到北京，即托人带信给毛泽东，告知北京的情况。当时袁世凯正四处

收买政客准备复辟帝制。毛泽东担心黎锦熙被拉下水，急忙写信给黎锦熙说：目前鼓吹帝制的舆论正在高涨，而正义则遭到阻止和压抑，人们正面临袁世凯要称帝的不好时机，仍须待时机成熟，才可以急图进取。黎锦熙回信解释说：他并未卷入复辟派之流，而是专心发起国语运动，志在民主和富强。毛泽东看信后很是高兴，后又写了一封 2500 多字的长信，将胸中的见解都说了出来。两人共同的志向和情趣，通过不间断的书信往来，使友谊也日渐深厚久远。黎锦熙在读罢毛泽东的信后曾说：“大有见地，非庸碌者。”1918 年 9 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黎锦熙知道毛泽东生活清苦，薪金微薄，便在节假日接毛泽东到他家打“牙祭”。两人久别重逢，热烈地谈论起时局和事业。

此后毛泽东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创办文化书社，领导新民学会，建立党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开辟革命根据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击日本的侵略，解放全中国，领导着革命一步步走向成功。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毛泽东一直没能和黎锦熙联系，双方的信件来往一度中断。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这位老师，他在延安遇见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马师儒时曾请马先生“问候我的老师黎邵西先生”。1948 年，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当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黎锦熙接到通知，让他速乘飞机去南京。黎锦熙撕掉了信函，坚定地对家人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哩！”

1949 年北京刚解放不久的一天，一辆汽车开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宿舍，车上走下了一位身材魁伟的人，他一见迎候在门口的黎锦熙，便迅速迎上前去，激动地连呼：“黎老师，

您好！”黎锦熙见毛泽东如此谦逊和善，连连回答：“不敢！不敢！”师生见面谈笑风生。老友重逢，亲切叙旧。当年湘江岸边、岳麓山下，一群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畅谈宏伟志向的情景仿佛又出现在眼前。自那以后，国家主席毛泽东经常接这位年龄相当的师友到中南海作客叙谈。黎锦熙也不辜负毛泽东的嘱托，兢兢业业地为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不懈地工作。

黎锦熙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每当我回顾毛主席早年度过的峥嵘岁月，心中总是激起无限敬佩和怀念的深情。”作为他的学生的毛泽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有志必有所为

——记朱德的第一位老师席聘三先生

朱德小时候在私塾随席聘三（名国珍，字聘三）学习。朱德在这里断断续续地读了8年书，老师给他取字叫“玉阶”。

席聘三是当地一位很有见识的学者，他多次投考秀才未中。后来回家设馆，以教书为业。乡中男女老少都很尊敬他。

席先生是个周身叛骨，朝气蓬勃的评论家。他满腹经纶，刚直豪爽，具有高尚的情操和骨气，宁可呆在穷山沟里教书谋生，也绝不去为那些丧权辱国的当权者卖命。他和他的老友们谈起教书的事时，多次说过：“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他经常利用讲课和课余时间，同学生们谈古论今，痛砭时政，用幽默而辛辣的语言，讥讽和揭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把中国拖进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深渊的可耻行径。同时又满怀激情地歌颂康有为等革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起抗争的大无畏精神。每当说到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悲惨情景时，席先生总是声泪俱下：

“现在，德国已经强占了我国的胶州湾；俄国强占了我们的旅顺、大连；法国强占我们的广州湾；英国强占了我们的威海卫和九龙半岛；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我们的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咱们中国快要被帝国主义瓜分完了。什么《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统统都是帝国主义缠在咱们脖子上的锁链啊！今日中国之命运，正像康有为先生所说：‘在覆

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任人驱使，任人宰割。’他提出的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我看是救国之良策。非变法不足以救国，非发愤不足以图存。要变法，要革新，绝不能指望那些帝王将相、达官显贵，而要依靠忠贞爱国之士。将来你们长大了，也要为拯救咱们中国出力，一定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做得到吗？”

“做得到！”学生们齐声响亮地回答，一个个脸上挂满了泪水，胸中激荡着愤怒。

朱德随席聘三读书，从10岁到18岁，这正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时期。他对席先生十分尊敬，因而受席先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时的朱德已经懂得过问国家事了。席先生痛恨恶势力和追求救国救民真谛的精神，以及他那强烈的民族感情，深深地感染着朱德，使朱德的眼界开阔了，使他的思想在几年里“慢慢开展了”。朱德后来回忆说：“在当时充溢着的思想，就是‘富国强兵’的事，我懂得做‘富国强兵’的事没有知识不行。”

从增长知识这方面来说，朱德在席先生门下读书，也获益不浅。朱德说：“在这个时期，只要学生想学什么东西，席先生就给讲什么东西。”四书、五经也讲，诗、词、赋也讲，还有《纲鉴》、《二十四史》。以后还教朱德读《左传》。因此，朱德能把四书、五经、《史记》贯通起来，《二十四史》也“大致记得”。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朱德面临着辍学的境况。而席先生舍不得放弃这个聪明、朴实而又好学上进的学生，决定破例免收他的学费，并让他搬到自己家里来住宿。朱德在这里除

了继续接受席先生的教育外，还能接触到席先生的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他们一起探讨真理，研究问题，这样他进步很快。有一天席先生带着学生们在园中散步，路过一棵果实累累的梨树，尚未采撷。席先生突有所感，便随口出了一副对联要学生们对答。他出上联是：“路边梨不摘”，朱德对道：“月中桂常攀”。席先生非常高兴，夸奖他才思敏捷、对仗工整，并且鼓励说：“代珍（朱德名字）有志，必有所为！”

朱德不再是个只知道嬉戏和玩耍的孩子了，他长高了，长大了。回家总是深深地沉思一些问题。他满怀激情地向伯父叔叔们讲述帝国主义怎么欺压中国和中国变法革新的事。家里人虽然不懂得什么叫变法革新运动，但他们都为朱德懂得这么多的天下大事而感到骄傲：“看那气度，这孩子将来兴许能当大官，干大事呢！”。有时候，朱德还趁马鞍场赶集的日子，向赶集的大人孩子们宣传中华民族正处在危机之中的道理，告诉他们说：咱们穷老百姓正面临着缴纳更多的新税，以偿付巨额赔款的悲惨命运。

在席先生的私塾里，朱德不但受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启蒙教育，还受到了热爱科学、追求进步的新思想的影响。席先生经常对他们说：“科学已使西方国家富强。到底是采用科学呢？还是趋于灭亡呢？中国也到了抉择的时候了。”他谆谆告诫学生们要勤学用功，将来好到外面去研究科学，“不这样，中国就没有道路可走！”

席先生所在的席家砭是个偏僻的小山村。在这里要想读到一本讲科学的书，实在是太难了。有一天，席先生从过路的外乡旅客手中弄到了一本介绍重庆一家肥皂工厂使用机器的小册子，里边有机器的图形和简单的说明书。就是这样一